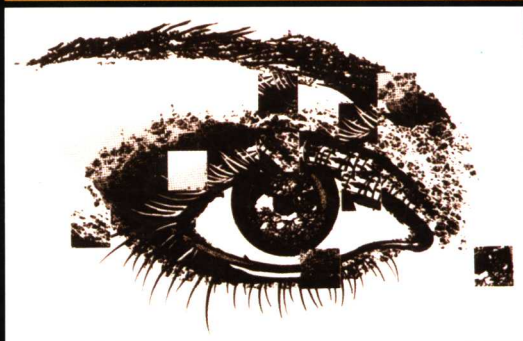


教育交流与教育现代化研究丛书

主编 田正平



吴民祥 著

流动与求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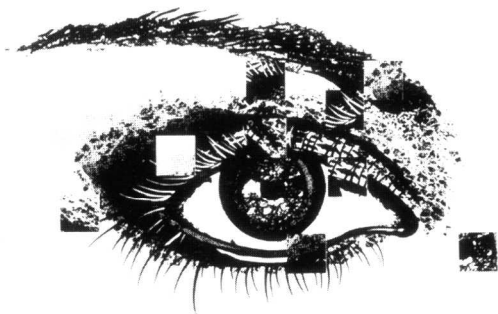
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流动研究

1898—1949

浙江教育出版社

教育交流与教育现代化研究丛书

主编 田正平



吴民祥 著

流动与求索

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流动研究

1898—1949

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动与求索——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流动研究:1898—1949/吴民祥著.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12

(教育交流与教育现代化研究丛书)

ISBN 7-5338-6722-X

I. 流... II. 吴... III. 高等学校-教师-人才流动-研究-中国-1898—1949 IV. ①G645.1②G649.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41930号

流动与求索

——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流动研究:1898—1949

吴民祥 著

责任编辑 孙露露

责任校对 戴正泉

封面设计 曾国兴

责任印务 温劲风

-
- **出版发行** 浙江教育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邮编:310013)
- **排 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 **开 本** 710×1000 1/16
- **印 张** 23.25 **插 页** 1
- **字 数** 360 000
- **版 次** 2006年12月第1版
- **印 次** 2006年12月第1次
- **印 数** 0 001-2 500
- **书 号** ISBN 7-5338-6722-X/G·6692
- **定 价** 35.00 元

联系电话: 0571-85170300-80928

e-mail: zjyy@zjcb.com

网 址: www.zjeph.com

田正平简介

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1981年于杭州大学教育系获教育学硕士学位。曾任杭州大学、浙江大学教育系主任、教育学院院长。现任浙江大学中外教育现代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理事长、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等。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教育现代化史、中外教育交流史、中国高等教育史等。曾主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教育部及浙江省重点研究课题多项,成果有多项获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科、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及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5年当选为首届浙江省特级专家。

吴民祥简介

1982年中等师范学校毕业,从事农村中小学教育工作。2002年于广西师范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2005年于浙江大学获教育博士学位。现为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现代化、中外教育交流史、教师教育等教研工作。曾主持、参与厅级以上研究课题多项,在国内较有影响的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

教育交流与教育现代化研究丛书

流动与求索

——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流动研究：1898-1949

借鉴与发展

——中苏教育关系研究：1949-1976

交流与改革

——教育交流视野中的中国教育改革：1978-2000

总 序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逐渐兴起了一股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热潮,这股热潮历经20多年而不衰,并且表现出越来越强劲的势头。说到底,这是我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华民族以新的姿态加强与世界各国友好往来、重新走向世界的现实需要,在学术研究领域的一种反映。其中,中外教育交流史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格外关注。其内容广泛涉及有关留学生派遣的研究,外国来华专家学者的研究,国外教育理论、教育方法在中国的传播的研究,教育文献资料流布的研究,中外官方与民间教育合作项目的研究,等等。我在90年代末曾做过一个十分粗略的统计,最近20年,仅中国大陆地区有关留学生问题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其数量就远远超过从1901年梁启超发表有关留学生的论文到20世纪70年代末,整整80年的总量。而且研究的参与者远不止是教育史工作者,作者群广泛地分布在教育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文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对教育交流研究给予特别关注的学术现象,而且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呢?我个人的看法,大致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实现教育现代化长远目标的需要。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处于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欺凌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尽快培养自己的人才上,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国家衰败是由于人才缺乏,而人才缺乏是由于教育不振。为了振兴教育、培养人才,近百年来,中国在教育上曾经全心全意地向日本学习,向美国学习,向欧洲学习,向苏联学习。这种学习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教育交流的过程;当然,在近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交流更多地以单方面的形式展开而不是对等的交流。主要形式是中国派遣留学生到日本、美国、欧洲和前苏联;聘请日本、美国、欧洲、前苏联的教习、专家来中国任教;借鉴这些国家的教育制度、管理制度、教学制

度；大量翻译这些国家各级各类学校的教材，等等。可以说，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或者称之为现代化）从19世纪60年代启动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外教育交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换句话说，中外教育交流曾经是推动中国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推动力。

那么，今天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长远目标，要尽快改变自己经济上的落后地位，要增强国际竞争力，人才问题仍然是最重要的问题；仍然必须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流，向一切教育上先进的国家学习；换言之，尽快实现教育现代化，对于中国而言，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当然，与一个世纪以前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大潮的情形完全不同的是，我们今天是主动地走向世界。应该说，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所制定和颁布的一系列法规政策中都体现了这一基本思路，中国的教育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正在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步伐加快与世界各国的交流，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为了使新形势下开展的教育交流少走弯路，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有必要对我们百年来在进行教育交流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这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我们学术研究者的责任。一百多年来中国在与世界各国进行教育交流的过程中有太多的经验和教训可以总结，也需要认真地予以总结。从历史的研究中为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支持和说明，这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自觉承担的责任。我想，这也是近20年来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中外教育交流的著作和论文大量涌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是当代中国对外教育交流蓬勃开展的现实需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加快了与世界各国教育交流的步伐，而且这种交流几乎涉及各个层面。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教育交流可以分为“显性交流”和“隐性交流”两种类型。所谓“显性交流”，主要是指那些能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人和物的交流，如留学生的派遣与接收、教育专家的交换与互派、教育制度的模仿与借鉴、先进教学设备的引进、图书情报的交流、教育资金的获取或赠予、教育项目的合作，等等。所谓“隐性交流”，主要是指教育观念、教育思想、教育方法方面的相互影响、融合和吸收，这些方面只能感受和意会，可以说很难看得见、摸得着。“隐性交流”往往是依附于“显性交流”的人和物而实现的，当然也不尽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外教育交

流,可以说是“显性”与“隐性”同时并举、全面展开。我想举三组简单的数据来说明:第一组数据是,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至2000年的20年间,中国政府派遣教育部(国家教育委员会)副部长级以上的教育行政官员(包括副总理)出国进行教育访问考察者,超过70人次,平均每年有3至4位最高级别的教育行政官员率团到世界各国进行教育方面的考察学习,出访地区遍及五大洲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有大批外国教育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交流,据统计,在1978年至1988年的10年间,有930个外国教育代表团的近5000人次到中国进行教育方面的考察访问。第二组数据是,截至2003年底,中国先后有大约70万公费和自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留学国家和地区达120多个,可以说遍布于世界各地。与此同时,进入21世纪,外国来华留学生的人数,以每年近1万名的数量在增长。第三组数据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与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开展的双边教育合作项目有数十个,包括中美富布赖特项目、中加大学管理教育项目、中英技术合作项目、中日学者交换项目等;与此同时,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国际组织有几十个教育方面的多边合作项目在进行。以上所举的是“显性交流”方面的一些数据和例子。从“隐性交流”角度讲,我只举一个例子,即教育学科最基本的教材——《教育学》教材的编写来说明这种交流影响的深入和广泛。197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署名上海师范大学编写组编写的《教育学》一书,全书共有注释61条,其中用领袖著作(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下同)作注释的有47条,占全部注释条目的77%;用中国文献作注释的有7条,占11.5%;用国外文献作注释的有7条,占11.5%。199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叶澜主编的《新教育学教程》一书,全书有注释227条,其中用领袖著作作注释的有41条,占全部注释条目的18.1%;用中国文献作注释的有60条,占26.4%;用国外文献作注释的有126条,占55.5%。两种教材,出版时间相隔仅12年,而引用文献中国外文献所占比例由11.5%上升至55.5%,这种国外文献引用率短期内的大幅度增长,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在教育观念、教育思想领域通过交流所受到的影响的深度。

面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空前广泛、深入开展的中外教育交流的现实,如何在政府的政策层面和实际的教育活动中,更好地,或者说最大限度

地获取教育交流带来的正面成果,而相应地避免或尽量减少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是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毫无疑问,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制定或调整对外教育交流政策,总是首先从本国或本民族的利益出发的,对于正处于发展中的中国而言,这个问题更显得重要。比如说,20多年来,我国的留学生政策就曾发生过多次的修订、调整;比如说,我国对于引进外国专家学者的政策也曾发生过多次的变化;再比如说,我国对于外国团体或个人在华办学活动的政策也一直处于不断的完善过程中。所有这些政策的调整、实施和修订不仅受到大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制约,同时也需要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的支持。这种现实的需要,同样成为推动教育交流研究的强大动力。我们已经注意到,近年来在教育交流领域涌现出的研究成果,不仅是对已经逝去的历史的研究总结和重新认识,也包括大量的对教育交流现实问题的研究,其原因正在于此。

再次,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为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条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氛围逐步得到改善,许多过去曾经是学术禁区的领域已经或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这就为教育交流的深入研究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条件和保障。比如说,关于教会大学的研究,长期以来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一直是把它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产物,当作批判的对象,这是由于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限制。8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开始从宗教传播、文化交流、教育交流的视角,重新审视和评价这一在中国存在了一百多年的教育现象,充分肯定教会学校,特别是教会大学在中外教育、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和影响。比如说,关于中国近代留学教育问题的研究,由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一批洋务运动领导人的地位和作用在最近20年的史学研究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这些变化本身也是学术环境宽松的结果),这也就使得对由他们倡导的、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运动的评价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再比如说,现在我们对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苏教育交流过程中的成绩和问题可以用更理智、更科学的态度进行回顾和反省,等等。宽松的学术环境和氛围对于繁荣学术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从这个角度讲,近年来教育交流研究的备受关注与大环境的改善也有着直接的关系。

以上三个方面——实现教育现代化长远目标的需要、当代中国教育改

革发展的推动和宽松的学术环境，我认为是促成近 20 年来教育交流研究形成热潮并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

辑入“教育交流与教育现代化研究丛书”的三种著作，正是试图从不同角度探讨教育交流与教育现代化关系的专题研究成果。丛书包括：《流动与求索——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流动研究：1898—1949》《借鉴与发展——中苏教育关系研究：1949—1976》和《交流与改革——教育交流视野中的中国教育改革：1978—2000》。其中，《流动与求索——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流动研究：1898—1949》是以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的流动为研究对象的一部学术著作。教育交流既包括与世界各国之间开展的交流，也涵盖国内不同发展条件下各地区之间的交流，而无论是国际交流还是国内交流，教师的交流（或称作流动）都是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由于种种原因，频繁的流动成为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群体的一个重要特征，而这种频繁流动对中国近代大学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全书选取在中国近代大学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为研究对象，从自由流动与压力流动两个方面，探讨了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的流动实况。应该说，无论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而言，抑或是教育交流史而言这都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借鉴与发展——中苏教育关系研究：1949—1976》是系统研究 1949 年至 1976 年间中国与苏联教育关系的学术著作。众所周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1976 年的近 30 年间，苏联教育对中国教育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全书把这种影响放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大环境和国内大环境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从世界教育交流的视野中对中苏教育交流的成败得失作出自己的分析评价。书中以大量第一手资料，全面展现了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在教育交流方面曲折而极富启迪意义的经验教训。《交流与改革——教育交流视野中的中国教育改革：1978—2000》是关于当代中外教育交流的专题研究。全书从教育交流的视野，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发展中外来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的研究与探讨。书中应用文本解读、个案解剖、定量分析等方法，审视、考察了 1978 年至 2000 年间我国教育改革的历程，力求对教育交流在我国当代教育改革的各个层面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以及这些作用和影响的程度，作出自己的判断与评价。当然，由于上述三个专题相对而言国内外可资参考的成果都比较少，从一定意义上讲，都可以说是一种开拓

性的尝试,所以各个专题的分析框架是否合理、研究的切入点是否准确、得出的结论是否科学以及史料的掌握是否全面等,这一切还有待实践的检验。我们热切地期待着学术界的批评指正。

浙江教育出版社在得知了我们的研究情况之后,慨然应允将三种成果结集出版,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支持,在丛书出版之际,我们谨向浙江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田正平

丙戌早春于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目 录

总 序	田正平
导 论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文献综述	2
三、本书写作的有关构想	7
第一章 思想的论争与教师流动	11
一、桐城“古文派”与江浙“新思潮派”对北京大学的争夺	12
二、东南大学“学衡派”与北京大学“新文化派”的抗衡	45
三、“新文化派”的分道扬镳：学术与政治的不同取向	60
第二章 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教师流动	75
一、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与北京大学	75
二、郭秉文的“文理并重、学术并举”与东南大学	83
三、张伯苓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与南开大学	93
四、梅贻琦的“端赖大师，教授治校”与清华大学	101
五、竺可桢的“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与浙江大学	107
第三章 学术机构、学术交流与教师流动	117
一、学术机构与大学教师流动	117
二、国内学术交流与教师流动	134
三、国际学术交流与教师流动	146

第四章 政治干预与教师流动	167
一、政治势力的“渗透”与东南大学的衰落	168
二、京师大学校与北京大学的受挫	174
三、北伐统一与罗家伦出长清华	179
四、首都南迁与中央大学的建立	191
第五章 经济窘迫与教师流动	203
一、艰难的“索薪”	203
二、生活压力与教师兼职	216
第六章 战争压力与教师流动	234
一、北伐战争与政局的变动	235
二、抗敌御侮与大学内迁	245
三、1946—1949年国内战争时期的大学教师流动	277
第七章 抗争与选择：吴宓从教历程	294
一、吴宓的成长环境、求学经历与性格特征	294
二、吴宓从教历程	311
结语	343
一、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流动的背景与原因	343
二、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流动对近代大学教育之影响	348
主要参考文献	351



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的“大脑”，是民族的精英，而作为知识分子中特殊构成部分的大学教师更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与“脊梁”。梅贻琦有句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竺可桢认为，大学作为“培养英才”的地方，必须倚重学识渊博、品德高尚、既教书又育人的教授。教学的质量，大学的声望，首赖教授的水平。他反复强调“大学实施教育，教授人选最为重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有了博学的教授，不但是学校的佳誉，也是国家的光荣”。由此，笔者认为通过研究中国近代大学教师这一特殊的人口群体，不仅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发展轨迹，而且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生活状况及社会变迁。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文化界名流大多跻身于大学，把大学作为他们表达思想、激扬文字的重要阵地，因而研究大学，特别是大学中的教师群体是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家及近代中国文化、思想、学术、政治等的一个重要窗口。

一、问题的提出

以人口问题为视角研究中国近代教育是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种新尝试。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是在中西冲突的矛盾中逐渐展开的，可以说外来因素是中国教育由传统走向近代的“催化剂”。但是外来因素必须通过中国社会内部因素才能起作用，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是在外因与内因的共同作用下，由社会各方面影响所构成的“合力”推动的，其中人口因素是这一“合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人口是指具有一定的共同标志的个人所组成的一个群体。这里的标志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地理标志，即居住在一个特定地区内的个人所组成的群体；另一类是特征标志，即具有某一种或某些共同特征的个人所组成的群体。就中国近代大学教育而言，大学教师这一特殊的人口群体既是大学教育得以产生的前提，又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根据人口学的理论,人口因素主要包括:人口构成特征与人口迁移(流动)特征。人口构成特征主要指人口的性别构成、年龄构成、文化程度、地域分布、职业构成等。人口的迁移特征主要指对一定地区的人口数量、分布和结构以及通过它们对该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能够产生影响的各种移动。人口迁移包括国内迁移与国际迁移两种类型。中国近代大学教师这一特殊人口群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他们频繁的迁移(流动)性。从原因上来分析,造成这种流动性的原因,既有大学内部的人事变动、思想论争、学术交流、学术机构的设置、课程专业的改革等原因,更有近代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经济窘迫、战争的驱使等外部因素。从类型上来分析,近代大学教师的流动分为两种:自由流动(主动流动)和压力流动(被动流动)。从流动的方向来分析:就宏观上的教育领域而言,分为流入大学教育领域与流出大学教育领域;就具体的某一大学而言,也存在流入和流出双向性。从教师的流动对近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影响分析,既有有利于近代大学发展的积极性流动,又有对近代大学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的消极性流动。

本书试图以“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的流动”作为切入点,研究中国近代大学教育。重点研究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流动?即近代大学教师流动的原因;第二,何以能流动?即流动的机制;第三,流动的结果是什么?即流动对近代大学教师构成、近代大学教育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从人口学的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大学教育,迄今为止,笔者尚未发现有专门的研究成果问世;从大学教师的流动这一切入点研究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也是一种新尝试。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可供参考的直接研究成果不多,且史料较为零散,这给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下面将笔者目前已了解的与本研究直接有关的主要文献资料综述如下。

1. 有关人口学理论著作。有关人口学理论方面著作很多,笔者主要参考的有:(1)魏津生著《现代人口学》(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书中对人口的定义、类型、人口学的研究对象、动态人口分析以及人口迁移、迁移格局和迁移决定因素等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2)佟新著《人口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作者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人口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并力图用社会学方法和理论分析相关的社会人口问题。(3)阎蓓著《新

时期中国人口迁移》(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书中对人口迁移的界定、人口迁移理论的评述与模式的建构、我国人口迁移的形成机制等方面论述颇有新意。(4)[美]西奥多·舒尔茨著,吴珠华译《对人力进行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在该书中提出了关于人口素质、人口迁移及人力资本的理论。

2. 大学史料类。笔者主要参考的有:(1)王学珍、郭建荣主编的《北京大学史料(1898—1949)》(全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2)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的《清华大学史料选编(1911—1948)》(全四卷共六册,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的《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 1981 年版)。(3)朱斐主编的《东南大学史》(第一卷)(增订本)(东南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4)石连同主编的《南大百年实录(上卷)·中央大学史料选 1902—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王德滋主编的《南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5)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编委会编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全六卷,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 至 1946 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6)王文俊、梁吉生等选编的《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7)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编的《厦大校史资料(1921—1937)》(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8)浙江大学校史编写组编的《浙江大学简史》(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以上是本书主要研究的几所大学校史资料,这些文献史料丰富,特别是有关教职员的聘任、管理、薪俸、教职员名录等部分内容,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3. 文集类。(1)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的《蔡元培全集》(共 12 卷,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高平叔编的《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高平叔编的《蔡元培全集》(共 7 卷,北京中华书局 1984 年版)。(2)《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湾中华学术院 1971 年印行)。(3)《张伯苓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王文俊等编的《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4)刘述礼、黄延复编的《梅贻琦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黄延复主编的《梅贻琦先生纪念集》(吉

林文史出版社 1995 年版)。(5)《竺可桢逝世十周年纪念会论文报告集》(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这些文集既有有关教育家本人所发表的教育论著,又有后人研究这些教育家的论文集。这些文集对研究中国近代大学教育史具有较高的价值。

4. 日记、书信、年谱类。(1)《竺可桢日记》(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2)《吴宓日记》(三联书店 1998 年版)。(3)《周作人日记》(大象出版社 1996 年版)。(4)《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 1979 年版)。(5)《鲁迅选集·书信卷》(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1 年版)。(6)《吴宓自编年谱(1894—1925)》(三联书店 1995 年版)。(7)张菊香等编的《周作人年谱(1885—1967)》(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8)曹伯言等编的《胡适年谱》(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9)孙玉蓉编撰的《俞平伯年谱(1900—1990)》(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10)蒋天枢撰写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11)王继权等编的《郭沫若年谱》(上)(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12)高平叔著的《蔡元培年谱长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等。这些都是研究中国近代大学教育难得的史料,它们真实地记录了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先驱者的活动轨迹,从中可以发掘很多有价值的东西。

5. 编、译、著作类。(1)有关北京大学的主要研究成果:萧超然等著的《北京大学校史 1898—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1 年版)。该书提供了作者研究北大前 50 年的成果,令笔者感到不足的是,其内容过于简略且以学生运动作为研究的主线,明显带有革命史的痕迹,但部分内容仍有参考价值。[美]魏定熙著的《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作者将北大的建立和发展放在中国政治文化,尤其是 20 世纪初期北京政治文化的背景下加以探究,探索学术与政治的边界,教育与政府的关系,论述北大何以成为中国最高学府,并超越教育而在中国具有一种象征意义。书中有关北大初期人事纷争、教员变更的内容对本书写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陈万雄著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 1997 年版)。作者从新文化运动溯源去展示第一代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及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以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倡导力量的集结,分析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如何形成,其历史性格又如何影响历史的进程。这些内容为笔者研究北大早期的教师流动与北大教育提供了一定参考。陈平原著的《中国